

总第004期
2017年12月号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本期要目

● 工作简讯

● 专家观点

葛承雍 丝路研究永远在路上

彭 林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意蕴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 活动综述

“文化写作与学人随笔专题研讨会暨李浩作品系列新书出版
座谈会”综述

●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文学院

主 办：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顾 问：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 江

主 编：李 浩

执行主编：张海青

责任编辑：陈战峰 任雅芳 胡永杰 刘晓宇

孟 飞 陈 艳

封面题字：袁行霈

● 工作简讯

我中心召开《昆池长歌》项目成果终审会



2017年10月21日,我中心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秦文明研究院召开《昆池长歌》项目成果终审会。2016年,西安市斗门水库(昆明池)项目被正式批准为国家推动水利“十三五”改革发展的重点支持项目。2017年6月,受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委会委托,我中心承担了《昆池长歌》一书的编撰任务,目的是从历史文化研究及文学欣赏的角度为从事昆明池规划、开发、建设工作的部门提供支持。自承接项目以来,中心全力以赴,先后召开选题论证会,邀请文史研究与文献整理方面的专家共同商定编撰体例、细则等,组织撰写小组,历时四个月圆满完成编撰任务。

2017年10月,《昆池长歌》进入专家终审阶段。终审会由中心主任、长江学者李浩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傅绍良教授、周淑萍教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吕卓民教授,文学院郝润华教授、张文利教授、沈文君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昆池长歌》选录篇目、文字叙述以及编撰意义等相关内容展开评审。与会者还有沣东新城斗门水库建设管理中心代表、编写组全体成员等。《昆池长歌》的编撰与出版不仅为斗门水库(昆明池)项目的文化工作提供了帮助,也为大西安的文化建设、为传播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文化写作与学人随笔专题研讨会暨李浩作品系列新书出版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2017年9月28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化写作与学人随笔专题研讨会暨李浩作品系列新书出版座谈会”在西安举行。来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总公司、上海分公司、陕西省总工会、陕西省高教工委、陕西省社科联、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作协、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西安晚报》、西安市文物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学者、作家近30人出席了此次座谈会。

李浩教授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汉唐文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主要从事唐代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在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之余,还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陕西文化、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关注与思考,并用文学的笔触形之文字,陆续结集出版。后经补充修改,201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李浩作品系列”,共包含《课比天大》《怅望古今》《行水看云》《马驹:道一传灯录》《流声:中国姓名文化》五部作品。

研讨会上,专家们就李浩教授系列作品的成就、特点、意义以及相关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李浩教授系列作品作为学人随笔,除具有文学性、可读性等特征外,还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融学术性和文学性为一体的文学样式。这是近年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具有启示意义,也给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当下中国正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迫切期待提升全民族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李浩教授系列作品的出现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我中心代表参加陕西省委组织部举办的 领导干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培训座谈会



2017年10月31日上午,由省委组织部、省干教办组织召开的领导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培训座谈会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举行。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孙国华主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秉琦、省干教办副主任郭文超、省委组织部干教处处长马亮,校党委书记王亚杰,校长郭立宏,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鹏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长期以来,我中心一直热心并积极参与省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的总体筹划、教学设计及授课工作,也派代表参加了培训座谈会。

会上,省干部教育培训西北大学基地负责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培训工作的筹备情况进行了汇报。王秉琦在听取了汇报后指出,开展领导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工作,是我省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抓紧落实好培训工作。与会人员就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开展领导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培训工作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讨论。

为了落实座谈会精神,11月1日下午,郭立宏校长在省干部教育培训西北大学基地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培训集体备课会并与各位专家座谈。

● 专家观点

丝路研究永远在路上

葛承雍

丝绸之路是一条沧桑之路。在古代交通条件艰苦卓绝的状况下,来回去往都非常不容易,除了恶劣自然地理环境外,还有战争拦截、强盗抢掠,一段一段的廊道需要以时间“年月”来度量,而不是以“里程”来衡量。丝绸之路并不是飘逸的丝带和迷人的曲线,更不是驼铃声声、牧歌回响的浪漫之旅,而是一条人类涉足生命禁区的跋涉之路。对二千多年来的丝绸之路同样需要重新回溯,用坚实的积累进行一系列挑战性问题的研究。

—

自从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倡议后,丝绸之路成为了最热门的课题,各地纷纷召开丝绸之路学术会议,群贤毕至,蓬荜生辉,不仅吸纳了国内名家,还聘任了外国名家,带动了整个学科建设和迅猛发展。“考古与艺术”“文本与历史”“诗歌与边塞”均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做了新视野的研究与探讨,不同专业各展优势、联合协同,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方向,因为这条道路再次促使我们以文明交融史的眼光看待世界。

这几年,各地、各个学校、各个研究机构纷纷推出“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研究,成立了不少机构,召开了不少会议,但挂牌隆重,后续无声,虎头蛇尾,声大势小,真正能推动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不多。因为丝绸之路是一个综合体的研究,涉及考古、文物、历史、艺术、宗教、科技、文学诸方面,未晓的知识和未知的领域很多。因之,丝绸之路是一个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研究领域,是一个观万幅画、看万件物的实践领域,谁都不敢说自己穷尽了史料挖完了文物,如果说学术永远在路上,那么丝路研究也同样永远在路上。

国际上普遍公认全球文明中心诞生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之间的肥沃田野上。将近五千年前,伟大的城市被陆续建了起来,如巴比伦、尼尼微、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和阿卡得以建筑的金碧辉煌而著称,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哈拉帕和摩亨朱达罗成为古代世界的奇迹。在东亚的中国大地上,夏商的古城也一个个冒出地面,崛起于世界地图上。只是当时人们并不互相认识,极少往来。

在这个地区,世界上一个个伟大的宗教也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祆教、佛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纷纷如百花齐放。正是在各个语系相互竞争的大熔炉中,一个个大帝国相继兴盛与衰亡,一个个王朝轮流登台与下台,但是展现的是相互连接的世界影响。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世界各国的密切往来,漠视欧亚大陆之间的竞争,并不了解西亚阿拉伯帝国与波斯帝国争夺的余震会影响到东亚中国,也不清楚拜占庭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通过西突厥的往来模式,也不清楚中亚粟特人入华的移民聚落和连环作用,也不知道中亚草原上厮杀直接带来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激荡,更不了解西域中亚胡商入华对双方贸易的物价变化以及导致市场上需求的激增。我们的眼光一直局限在自己的疆域内,龟缩在东亚这一小块土地上。

欧亚之间互相影响的展开,正如沿着中西古道形成交通网络一样,不仅有商人、僧侣、使者、武士、牧民、工匠、画师等等的拓展,还有他们携带的买卖商品与运输的货物,以及思想的交流、文化的借鉴、

宗教的传播,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走的这条路是东西方沟通的要道。在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被闭关锁国,甚至不知道几千年来自己祖先一直活跃在亚欧大陆上。直到19世纪末,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庞大交通网路,才被一个德国地质学家、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冠名为“丝绸之路”。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权威们对丝绸之路并不重视,他们认为落后的亚洲和劣等的民族无法与欧洲文明的摇篮相比,更不相信东亚的崛起和亚洲地区的重要。1895年,当斯文·赫定第一次探访塔克拉玛干时,就进入了一个欧洲人全然无知的偏远世界。多亏这一地区的干燥气候,赫定、斯坦因等人才能发现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各种文书文物。随着一个世纪的考古文物不断发现,他们才意识到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地位,才认识到西亚、中亚、东亚一条文明传播道路的活跃,这是世界中心所在地的真正大熔炉。如果说中亚和新疆是四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涉及到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国家,那么东亚广袤地区构成的交通道路网络状布局,更是将中国、蒙古、朝鲜、日本诸国串通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西方文明中心诞生地与东方文明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扩大拓展了新的世界史课题的视野。

二

历史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源头,了解历史是每个中国人的基本素质。但是中国人包括一些学者在历史知识素养上并不高,历史常识匮乏,专业知识狭窄,获取的信息来自影视或互联网文学作品,应付差事写一些与史实有偏离的文章,名曰是多元化解读,实际上是不知历史研究的严肃度和真实度,目前一些虚构历史的到了挑战历史真实的底线。

过去我们是半截子丝绸之路研究,现在又出现不分时代的纷纷乱象,值得我们反思:

2013年12月3日《西安日报》刊登的《加快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一文,为了吹嘘夸耀自己是承载区,说“唐代西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米,涉及酒肆、铁铺、衣行等220多个行业,有固定商铺4万多家,每日客流量高达15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流通和货物集散中心,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这些数据都不知是谁编出来的,史书记载还是考古解读,都不清楚。

2014年7月21日《光明日报》文化新闻9版《新丝路万里行》一文说:“丝绸、茶叶、瓷器曾代表了汉唐时期的先进制造业,中国商人用它们来交换胡椒、胡萝卜等产品”。茶叶是在中唐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产业,当时喝茶主要是泛白沫的煮茶,用盐“点茶”,从南方到北方也只是在贵族世家、官僚士人家中饮用,民间百姓谈不上普遍喝茶,法门寺作为皇家寺院被发现茶碾子就是明证。茶叶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在当时还见不到确切的记载,茶叶贸易到了宋元时才开始广泛起来。唐代与回鹘的绢马贸易并不是后世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

2014年11月15日《西安晚报》刊登《范曾50年后回归诗词故乡》一文,范曾对记者感叹道:“西安是座不得了的城市,当年中亚、西亚一直到罗马,在西安的外籍商人有三四十万人,绝对是国际化大都市”。史实本末,这外商数字不知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倪方六《隋唐时外国人以留学中国为荣》一文中说:“中国大规模接受来华学习的外国学生出现在唐朝,日本、高丽、百济、新罗、安南(越南)、琉球以及拂菻(东罗马)、大食(伊朗)等国家纷纷向中国派出留学生或带有留学性质的使臣、僧人。”拂菻什么时候派过留学生?史书哪条史料有记载?

故宫举办“紫禁城与丝绸之路”展览,将明清时代为皇家采购或进贡的西洋玩意作为丝绸之路的珍宝,令人啼笑皆非。先不说明清严格的海禁政策,即就是陆路交通也是时常被阻塞切断,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陆上、海上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活动。故宫钟表馆展出的西洋钟、八音盒等统统

属于供皇帝玩赏之物,并不是真正的民间实用之物。将皇家采购、外使进献的奢侈玩意与民间正常贸易的实用之具这两类物品混为一谈,不能区分“贸易品”与“奢侈品”,连丝绸之路的本意是贸易之路都搞不清楚,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广州的清代十三行、厦门的鼓浪屿、宁波、烟台、大连等等因为 19 世纪中叶后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统统列入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形成的茶马古道也被列入高原丝绸之路,早已有之的“唐蕃古道”也变成了丝绸之路高原段、青藏段,北京也成了元代丝路“无与伦比的商都”,似乎不挂上“丝绸之路”名号就不是新的研究。还有许许多多信口雌黄的奇谈怪论,甚至胡诌乱讲,脱离历史实际和正常逻辑,引起很多学界人士的反感,被讥讽为成套路的追捧剧。

2010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时,我请著名文物学家孙机先生为展览图录写序言,他在感言中就指出:“强加给这条道路的某些说法与史实未能尽合,许多无稽之谈有时也会有市场,未免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孙机先生的某些观点不一定会得到现代某些人完全同意,但是他的批评一直回响在我耳畔,提醒我们对丝绸之路一定要认真研究,作为人类共同的知识谱系需要慢慢解读,这也是我们的共勉、共助、共享。

三

丝绸之路研究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概念符号,不是经济学急功近利的利益获得,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遗产真实再现,需要必备的功课铺垫,需要多年的学养积累,一些奇葩的概念混入严肃的课题之中,只会败坏学术的名声,授人以口实与笑柄,带来无穷的贻害。

虽然历史研究可以存在各种解读,但应该在基本公认的史实上保持客观真实,要注意一些带有引申性的过度解读,甚至是想当然的曲解。我们对历史的尊重要逐步恢复,再不能在基本史实错误的情况下信口开河了。不管是“二重证据法”还是新近提倡的图像史学,都要注意丝绸之路是任重道远的课题,还是那句话“丝路研究永远在路上”。

目前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热词不仅响彻中国,而且远播世界,自然引起了各国的关注。有的心存疑虑,有的冷眼旁观,国际上反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杂音、噪音、乱音也此起彼伏,印度为对抗抵消中国的强大影响力,将其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在 2014 年改为“东进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还模仿“丝绸之路”构思推出所谓的“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从“东望”到“东进”的一个对冲目的: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我举一个最近国际学术界的例子,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多次到中国学术考察,她推出的《丝绸之路新史》使用了许多原始出土文书和考古材料。这本书基本观点就是从来没有一条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由一个德国人在 1877 年发明的,在那之前没有人使用“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商队从来不大,通常只有几个人和几匹马。沿着这条道路走的贩卖是地方性的,不是区域性或国际性的。中国从来没有与罗马帝国贸易,在中国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单一的罗马硬币。尼雅佐卢文文书近千件只有一件提到商人,而且商人都被严密监视。各种中原生产的纺织品被运到西北,这是因唐朝政府把海量纺织品作为军饷发放给士兵,这是 755 年之前盛唐时期丝路贸易繁荣的原因。安史之乱一爆发,唐朝被切断了供应,丝路经济随之崩溃。因丝路艺术而闻名古都长安,出土的何家村遗宝有 100 多件金银器,仔细研究之后发现,几乎没有进口物品,都是本地制造的或出自客居中国的粟特人之手。进口的珠宝很容易通过陆路送进来。如此种种,不再赘述。总之,她提供的史料说明丝绸之路就是一个编造的迷人故事,是贸易有限、论据不足而被夸大的浪漫之路。

这本书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列为高校必读的亚洲教材,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了译本,我们对

这类有影响的图书居然无人反驳,还有人叫好吹捧,蒙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根本不知道国际话语权有多重要,更不知道要用扎实可靠的史实回应世界的质疑。

最近西安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等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行”大型活动,提出“将丝路火种播撒到世界每个角落”,着实令人惊讶。目前丝绸之路领域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数量猛增,但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现象也层出不穷。如果说丝路研究永远在路上,那么与国际对话的顶尖学者也急需蓬勃而出。熄灭学术浮躁之虚火,摒除急功近利之欲望,丝绸之路研究需要求真求实、创新开拓、不断升华的成果,这是我们衷心的期望。

(本文系2017年9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陕西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化”国际高端论坛论文,作者葛承雍先生系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意蕴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彭 林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德”作为价值核心。“士”是为引导人们修身进德而构拟的道德形象,并被赋予种种人格内涵。为天下而奋斗献身的担当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德;士;以天下为己任;中华传统文化模式

近代以来,最令中华民族纠结的问题,莫过于文化选择。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本国文化的信心彻底崩溃,“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不二之选。世事沧桑,百年之后的今天,迫切需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再认识。中华文化存在的价值,不是为证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中国学者理应深入发掘本国文化的核心意蕴,与国际学术界平等交流,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借鉴。

一、以“德”为灵魂

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的内涵与气象各有千秋。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德”作为价值核心,其起点是在殷周之际。武王伐纣之后,周人反思夏、商亡国的教训,两朝都曾经秉受天命,并且享有不短的国祚,可惜“惟不敬厥德”(《尚书·召诰》),对道德没有敬意,极度腐败,“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尚书·酒诰》),上天将丧亡降给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周公要求周人体谅小民“稼穡之艰难”(《尚书·无逸》),像文王那样,“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尚书·康诰》)。周公还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古语,要求周人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以之作为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在周人行将迁都于洛之际,召公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国由此走上了以人为本、以道德为灵魂的“民本主义”道路。

在周代文献中,周人赞美道德之语可谓触目皆是,见于《诗经》者如“德音莫违”(《国风·谷风》)、“德音不忘”(《国风·有女同车》)、“德音不瑕”(《国风·狼跋》)、“德音不已”(《小雅·南山有台》)、“德音孔昭”(《小雅·鹿鸣》)等;见于《左传》者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传·僖公五年》)、“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等;见于《国语》者如“懋正其德”“奕世载德”“光裕大德”“懋昭明德”(《国语·周语上》)、“圣人树德于民”“德音不愆”“前哲令德”(《国语·周语下》)、“以德荣为国华”(《国语·鲁语上》)、“天祚有德”“以德纪民”(《国语·晋语四》)等,不胜枚举。“德”被视为立国的根基、判断善恶是非的准绳。先贤对于德政的论述极为周备,如召顷公说:“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守终纯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国语·周语下》)此将慎、成、端、正作为令德的表征。

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德治思想,笃信只有道德才能赢得长治久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他主张君子要为社会树立道德表率,以此教化民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以道德服人之说,影响最为深远,历代学者多奉为圭臬。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他认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高城、深池、坚兵、利器、积粟、储米,也不是封疆、险固,而是人心的向背。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高扬道德理性,经过千百年的传诵,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

在我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中,曾有过几个国力极为强盛的时代,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船队远至东部非洲,但中国始终没有成为殖民者。这是因为以“德”为灵魂的中华文化没有掳掠与奴役他人的罪恶基因。当今有西方学者宣扬“凡强必霸”理论,断定正在崛起的中国必然要走向霸权,并以此为借口,对中国施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中华文化无知。

二、以“士”为人格楷模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成为怎样的人,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走向。早在与古希腊大体同时期的周秦时代,中国先哲就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究竟何在的问题。人由动物进化而来,故人与之相似之处极多。以大猩猩为例,按照现代动物分类学理论,人与大猩猩同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类目;从解剖学的角度看,人与大猩猩的骨骼结构几乎一样,肌肉块数完全相同,雌性的大猩猩也有月经,两者之间的分界似乎相当模糊。人类若不能划清与禽兽的界线,就永远不能真正挺立起来、找到自己的尊严。

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的命题,并将“士”作为人格典范来塑造,希冀全社会以此为楷模,修身进德,实现人身的道德价值。

先秦时代,贵族阶层的基本构成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下层,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故人称“闻一知十为士”(《说文义证》),“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说苑》)。他们求学的重心在“道德”,所以古人每每以此来定义他们:“守道者谓之士”(《新书·道术》),“士,蹈道者”(《尚书·多士》),“士,讲学道艺者”(《国语》韦昭注),“士,谓进士有德行者”(《礼记》孔疏),“士,有道德之称”(《大戴礼》王聘珍解诂),“士者,有德之称”(《尔雅序》邢疏)。社会各界都将士作为道德楷模来追慕。

周人崇信“天道”,视其为天之正道、宇宙公理。天道在人类社会的投影,即“君子之道”,是人生的正道。士追求“道”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高目标。生命诚可贵,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寿命长短,而在于是否得“道”,即是否获得真理。孔子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将临危受命、见利不忘义作为立身之大节,甚至舍生取义,“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他们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毕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此后,每当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杀身成仁”都成为万千志士慷慨献身的精神动力。

士以近乎严酷的要求修身进德,“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他们有很强的道德自律意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更是中国尽人皆知的存问反省的格言。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居仁由义”(《孟子

·离娄上》),身体力行,宽宏强毅,以毕生的精力践行自己的学问,《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论语·泰伯》朱熹注)他们无论仕与不仕,周身都充盈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古之所谓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可贵者也^①,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荀子·非十二子》)

孔子、孟子、荀子等所论之“士”,绝非实有其人,而是为引导人们修身进德而构拟的道德形象,并赋予其种种人格内涵。受此激励,历代社会都有大批品格高尚的士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中华文化非常独特的地方。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1]近代以来,尽管西学大有取代中华文化的趋势,而千年积淀而成的传统依然潜流涌动,以各种看似不经意的形式顽强地存在。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在完全模仿西方建立的中国高等学校,所有学位、学衔的名称,都嵌入了作为中国文化人象征的“士”字,如学士、硕士、博士、院士,只是今人习焉不察,不知其中深意,甚至已经消解其中的道德追求,变成纯粹的专业名称,令人伤感。

三、以天下为己任

人类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历来被认为是西方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其实,中国先哲凭借口耳相传的史料,以及周边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学资料,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经历过由原始到开明的进化过程,这在许多著作中都有叙述,如“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卷一);“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易·系辞》);“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虻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修务训》)。

先贤还认识到,人类是群体性的动物,惟其如此,故能战胜各种猛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将历史绵延至今,离开集体,谁都无法生存下去。中国人的“为君之道”,正是基于对人类能“群聚”、懂得“相与利之”这一道理的认识而建立起来的:“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吕氏春秋·恃君览》)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希望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社会重视群体利益、忽略个人发展,因而是错误的。此说似是而非。中华文化中的士都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优秀个体。士所希冀的利益最大化,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再扩而大之,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先哲的认知逻辑是,既然“利出于群”,故群体重于个人,“小我”理应服从“大我”。大量优秀的“小我”成就了强大的“大我”,“小我”与“大我”是利益共同体,并不对立。个人只有全身心融入群体,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个人价值才可实现最大化,才可成为千古为人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尧与禹就是其例:“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监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

与柏拉图一样,孔子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理想世界,将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① “可贵”本作“富贵”,据王先谦《荀子集解》改。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他憧憬“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未来社会。

《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径。儒者终身学习,旨在报效天下。《礼记·儒行》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先实现自身的人格价值,然后以身许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必要时可以牺牲“小我”,捍卫“大我”,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共同的人生理想。曹植说:“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求自诚表》)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陆游挑灯夜读《出师表》后言:“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这些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价值观宣言。

北宋承五代之乱,积弱积贫,又受辽、金纷扰,国势危殆,而学者多有为国分忧之志,并由此确立了中华的“天下观”。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到明朝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名联谈趣》),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为天下而奋斗、献身的担当精神,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扎根于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

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关注彼岸世界,人虽然身体在今世,但实际上却是为来世而活着。今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希冀死后有好的来世,都是围绕着“我”的命运而忙碌。中华文化则不然,它不强调彼岸世界,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活在当下,儒学是入世的学问,所学所为,目的都是推动现实社会的进步,没有今世与来世的利益交换,只有浩然坦荡的无私奉献。

四、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模式

各民族的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大约500年中,西方殖民者垄断了全世界的资源,长期奴役广大地区的人民,毁灭了他们的文明。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他们制造出“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白人是高等人种”等种族主义理论,企图彻底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殖民时代结束后,某些国家继续图谋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进而图谋文化霸权。他们变换手法,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宣称自己是站在道德高地之上的上帝的选民,是理所当然的世界警察,唯独他们的文明才具有普世价值,其他文明都必须以西方文明为旨归。

西方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模式吗?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学者意识到西方文明的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到西欧考察,他目睹了这场由于列强分赃不均所引发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意识到中国人不应盲目学习西方制度,尤其不能先把自己学成帝国主义,再去侵略别的国家。

梁启超认为,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两者并行不悖、各有优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从大脉络入手比较中西文化,认为无论是上世史时代还是中世史时代,都是“我中华第一也”,唯独近世史时代不如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自尊,说要“三薰三沐”,感谢上苍,让他成为“此伟大国民的一分子”;他坚信,世界的前途正在大变动之中,“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2]!中华文化非常优秀,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他还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当今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本位文化。1914年,他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

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3]

当时的清华师生普遍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但民族精神不能从外国引进;“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依附于西方列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与自强。1925 年秋,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教育”,大都是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他希冀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寻出中国之国魂”。^[4]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以钱穆为代表的爱国学者倡导唤醒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惟有以本位文化为灵魂,“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5]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批评某些人在“救国保种”的旗号下诋毁传统文化,认为“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6]^{P399},进而“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深恶痛疾之意”^[6]^{P399},其结果无疑会伤及国本,走向亡国灭种之路。

1941 年,著名学者贺麟指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其主流、根本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他说:“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7]近百年来,西方世界某些损人利己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各国的质疑,例如此前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却要由全世界为之买单,成为“美国感冒,全世界吃药”的典型案列,西方文明的各种弊端现已显露。弘扬东方文化之长、抑制西方文化之短,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许倬云先生指出:“中国曾经是和西方文明并行发展的另外一个文明系统。近两百年来,中国逐渐屈服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力量。但是下一步呢?我们会看见怎样的世界?我们是否也应讨论作为一个曾经独立于西方以外的文化系统,此后将何以自处?”^[8]

余英时先生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中国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古文明如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相提并论。……我们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9]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10]又说:“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10]这就表明,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是全方位的,除了包括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战略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战略。

中华文化曾经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擘。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是我国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

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为中心;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中华文化要求人们通过礼乐双修,涵养高雅气质,践行仁义礼智信,成长为道德高尚的“君子”。中华文化重视家庭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机体的健康细胞,自古把乡风民俗的端正看作国家的元气之所在,着力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中足以骄人于世的精华。

当今之世,宗教多具有排他性,因而多有局限性,而中华文化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局限。虽然欧洲长期以来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但如今的欧洲年轻人正面临着将自己的灵魂交给谁来管理的严峻问题。中华文化似乎早就为这一局面做好了准备。中华文化超越宗教,人们可以自己管理灵魂,从而为

解决西方年轻人的困境提供了希望。我们应该克服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卑心理,看到自己文化的优越性。

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波及广袤的南北大地,覆盖面之广远非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可比。因幅员辽阔、地貌各异、风俗迥别,故思想家著书立说都会兼顾四方的种种差异。《礼记·祭义》中说:“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此即后世“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语的出处,是中国人注重自己学说的普适性的鲜明表述。

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参考文献

- [1] 钱穆. 国史新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2.
- [2] 梁启超.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总论5.
- [3] 黄延复. 清华传统精神[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17.
- [4] 曹云祥. 开学词[J]. 清华周刊,1925(350):4.
- [5]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扉页.
- [6] 钱穆. 国学概论[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 [7] 贺麟.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17.
- [8] 许倬云. 五百年来西方[N]. 新京报,2013-12-09(C08).
- [9] 余英时. 比较西方,汉学已经彻底全球化[EB/OL]. (2014-09-18)[2017-01-13]. http://news.ifeng.com/a/20140918/42021382_0.shtml.

(本文原发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1期,作者彭林先生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活动综述

“文化写作与学人随笔专题研讨会 暨李浩作品系列新书出版座谈会”综述

2017年9月,值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暨汉唐文学研究院李浩教授散文作品系列(《课比天大》《行水看云》《怅望古今》《马驹:道一传灯录》《流声:中国姓名文化》)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之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西北大学联合在西安举办了“文化写作与学人随笔专题研讨会暨李浩作品系列新书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近三十位学者、评论家、作家和媒体界人士参加了座谈研讨。

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在座谈会上做开场致辞。王亚杰书记介绍了李浩教授近年来在行政管理岗位和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李浩教授为西北大学赢得的荣誉,同时又对李浩教授在散文写作上的丰硕收获表示祝贺,并预祝座谈会圆满成功。作为“李浩作品系列新书”的出版方代表,翟德芳总编辑回顾了三联书店出版当代学人散文和随笔的历史,介绍了李浩散文随笔系列作品的策划出版过程,并对五部作品一一评价:《怅望古今》《行水看云》“精致典雅”,《课比天大》体现了“师者情怀”,《马驹:道一传灯录》“史料丰富,文笔精彩”,《流声:中国姓名文化》“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翟德芳从当代学者散文写作大环境出发,认为李浩教授的散文随笔“内容丰富,博物洽人”,与陈来、李零等学者的散文写作旨趣相似,是当代学者散文的特色产品。

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冰心散文奖、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得者白阿莹在座谈发言中指出,李浩的散文随笔呈现出一个多重身份叠加的李浩,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李浩、大学教授的李浩、作家的李浩叠加在一起,通过文字显现出了一个胸怀大抱负、追求大作为的大家李浩。陕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颖科把李浩的散文随笔归结为求真、创新、致用三个特点。他认为李浩的散文随笔散发着一股“真”气——学者本性的“率真”、直面问题的“问真”、出谋划策的“本真”,显示出李浩求真的勇气。因此他的文字自然流露,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剖析问题矛盾时穷追不舍,总要问个究竟,能够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有关文学、文化发展现象和问题进行梳理评判,并开出务实管用的医治之方。同时,李浩散文随笔充满着强烈的创新气息:一是视角创新。二是观点创新。三是路径创新。但是,李浩并非标新立异,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有着求实致用的目的。散文最可贵的品格在于它的现实感、现场感,在于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见识、魄力和勇气。李浩的散文随笔正是采用卷入式、直入式方法,直接参与当代陕西文学、文化发展的思考与构建,具有很强的致用性。

基于三十年的交往经验,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指出李浩是勤奋的学者型作家、有文化的作家、有修养的作家,他的文字有学养根基、言之有物,而贯穿在五部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是一个学者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党怀兴教授祝愿李浩在研究高深学问之余,继续文化散文写作,继续展示学者的情怀,这些著述必将化民成俗,产生不可小觑的社会影响。从西北大学“作家班”走出去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冰心文学奖获得者吴克敬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为李浩的五部散文新书是他回头路上开出的鲜花:李浩老师主动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返回到他热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中来,整理旧作,

推出新书,正是他回头捡拾来时路上鲜花的明智之举,这也预示了做人通透、学问通达的李浩在散文写作上必将有更大的收获。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教授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为李浩作品新书出版相贺——“怅望古今,行看水云”。一联八字也是对李浩五卷本作品系列的一个评价:怅望古今是为了会通古今中外,行看水云是为了书写水云万象。“怅望古今”带来了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观点,指其系列作品内容丰富,古今中外,话题繁多,凝眸审视,感慨万千;“行看水云”带来了细腻和优雅,指其文笔有“行走文学”的某种特点,这是思想的远行、思虑的深远,寻寻觅觅,上下求索,随笔记录,行文舒展。前者主要是内容的揭示,后者主要是风格的呈现。由其“怅望古今”,可以看出大的气象;由其“行看水云”,可以领略其文的风格。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美文》杂志执行主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穆涛则用幽默的比喻来形容李浩的散文作品——“吃小吃,要到大馆子”。穆涛认为李浩的随笔散文是一个学问大家的“余事”,是李浩从事科学研究、学术著述之余的“不正经”笔墨,但又与他多年的学术研究有密切关系,两者一体两面,其散文的个性特征正来源于他多年的学术专长,所以才文思通透、文材丰富、文笔自然。

陕西省作家协会评论部主任邢小利说,读李浩的散文,即使不识其人,也能判断作者是一个知识人,因为他的文章有书卷气、真性情,其博雅、通脱是他多年涵泳于中国优秀文化的结果,其率真、淡定是他禀赋的体现。西安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高亚平对李浩的散文做了细致解读和精彩点评,他认为李浩的作品有知识,有学养,有艺术性,文字信笔写来,舒卷自如,如行云流水,完全当得起知识丰赡,文采斐然的评价,是真正的学者型散文。具体来讲,有三个特点:一曰打通古今,关注当下。李浩的散文题材驳杂、宽泛,异常丰富,凡有所忆,有所感,有所思,皆著而为文,继承唐宋散文传统,借古论今,对当代社会积弊、不良风气,有所指陈讽喻,所以从他的《盗贼、杀手与大师》能读出一种激烈,从《教师的三重境界》能读出对新教师殷殷期望。他记述师友、亲友间的文字,则处处透着温暖亲切,其写与霍松林交往、与星云大师来往的文字,虽属忆旧怀人类,亦和时下的社会贴得很近。二曰立意高远,有大境界、大情怀。此由其学者身份所赐。如《原侠》本是一篇学术论文,不但考述了侠的历史,更指出侠对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示儿》一文,由四通家书组成,尽管都是一些家庭琐事,但细细写出满满的正能量,让人体会到“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的亲情。三曰语言平易通脱,如行云流水,看似平白如话,无有技巧,却尽得天然之妙,《一城文化,半城神仙》可作例证。

西安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辉认为,李浩教授为人为学都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远大追求,既不离弃“事功”,又对“有情”生命颇多眷顾,这是其作品的一贯志趣,也是其用情用心之处。其作品有闲心、闲情,却并非“填闲”或“帮闲”,而是以对迫切之现实问题的切己体察做底子,所以绝少花鸟虫鱼、吟风弄月之闲情逸致,多有陈仓暗度、借此喻彼之“隐微书写”。如《我之大学教育观》《钱学森难题别解》《西北联大与学术自由》诸篇所涉问题均为当下教育界及学界之重要问题,基于较为复杂之现实原因,对此类问题之条分缕析虽未必玄奥,但难于直言之处甚多,其间之闪转腾挪藉此喻彼之处,更见作者“佛陀愿”“老婆心”般的文化坚守和情怀。《知识人研究刍议》《困境与学术突围》《散文的虚热与希望》《趋势与走向》《我们的生活缺失什么?》《诗运三关:从古典到现代》等所涉内容或有不同,却均属个人对日常生活世界之诸多问题的关切与思虑。举凡历史、时代、教育、世道、人心,诗与史,情怀与担当,文学之境界诸多问题均多所发明,且不乏对时代习见经验的“冒犯性”,一如王尧先生所论,“如果深味,李浩的文章其实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在内敛中藏锋芒,平静中亦有几分狂狷。”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鸿虽未能亲临研讨,但也转致书信表达贺意。朱鸿

教授在信中写到,“李浩兄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写了大量的随笔,内容涉及人生感受、文史所悟、教育所思、姓氏所究及名僧之传。其文化视野的开阔,知识网络的繁密,思想触角的机敏,皆可钦佩。李浩兄系列新书的出版,不仅是文学界的喜悦,而且是教育界的惊奇。……他的随笔走在大道上。他的随笔是文学与学术的融合,正如论文以文学而飞扬一样。他的作品并未由于笼罩在僵化的论文之中而胎死腹中,或者发出让人肉麻的文艺腔和老朽调。喜悦在此,惊奇也在此。”

由于与李浩有同学、同事、甚至同乡的多重关系,相较上述专家学者的讨论,西北大学文学院周燕芬、图书馆馆长杨乐生、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锋、文学院院长段建军、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宗峰、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春泉、学报编辑部主任刘炜评等专家的发言更为活泼多样。

周燕芬教授回顾了与李浩三十多年的交往,认为李浩丰富的人生经历及其学术殖养的积累和阅历身份的变化,足够一本传记来承载。但是在她眼里,李浩一如当年的师兄,那种温良简行、质朴端正的书生品质,一直与他的为学为人紧相伴随,成为他文化性格的真本底色。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周燕芬认为李浩的随笔创作应该算作比较标准的“学者散文”,因为集子里所有的文字都是以他的深厚学养为底蕴,以一个学者的生命体验为表现对象,以知识考古和理性思考为思想支撑,最后呈现出一个融知识修养和丰富内心世界为一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形象。从学者著述的角度看,周燕芬又认为李浩的随笔散文是另一种方式的学术研究:《流声》是一卷研究中国姓名文化的专书,为了方便普通读者接受,写得既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马驹》是为马祖道一大师作传,作者“试图用通俗的文字描绘大师的行谊风采,揭示大师的精神境界”,“让大师真正走到我们大家中间,用他的智慧和机锋来浸润现代人干枯焦裂的心田”,同样是兼顾了专业学问和文化情怀的一本好书。

王春泉教授另辟思路,认为人们虽然可以给“李浩作品系列”贴上“学人散文”“学人随笔”的标签,甚或赋予它“文化写作”的新写作身份。可是,按照传统措辞学理论所宣认的散文、随笔各自就是一套论述的罗网,有其显著的愿景、经典、话语、纪律与边界,文字优美,灵动巧思这样的思考取向,“李浩作品系列”中的相对数量的作品不能直接归类到“散文”/“随笔”的旗下。实际上,李浩的写作是一种“不分类的书写”。透过“不分类的书写”,李浩挑战了界限与规则,将我们带到一个必须思考与探究的关口,逼着我们试着回答这个新的斯芬克思之谜:散文是否有先在的本质?散文有边界吗?倘若有的话,在一个“知识生产模型Ⅱ”主导的时代里,那些既有的边界又该如何应对“急剧的增长”“异质性”“情境化”这些“知识生产模型Ⅱ”知识特征的历史性挑战?当然,李浩的创作绝非爱因斯坦批评的那种仅仅看看报纸信息就大发议论的“轻的文字”的重现。作为沉思生活、行动生活中的体认与解读,李浩的专著和他的散文是“等价信息变换处理法”的人类性呈现,存在“个人一致性”,但如何发现这些充满德勒兹意义上“块茎”——其典型生态学特征主要包括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斜逸横出、变幻莫测——特征的人生大道上散步的文字所包裹的“实践信念”,则是他的散文读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样不愿用“学者散文”“文化写作”等概念来概括李浩散文作品的杨乐生教授认为,散文就是散文,只有好的散文与坏的散文之别,没有学者散文、农民散文、工人散文、工程师随笔、领导人随笔之分。李浩的散文创作起步早、眼光高,多年来不断调整、变化,已经写出了优秀的散文,但也并非篇篇皆好。不论是读者还是李浩本人,如果把他看作成长中的作家,他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会更大。而同样致力于诗文创作的刘炜评教授则用一联对李浩的创作进行评论——“智不可及,愚不可及;狂也有成,狷也有成”,他还请友人书写自己赠与李浩的一诗:“郢客心同天道侔,谁能辄下缚清喉?回车且向潇湘路,漫作精神自驾游。”希望他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此外,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段建军、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宗峰、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峰,陕西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李震,《西安晚报》编辑贾妍等亦有精彩发言。

最后,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汉唐文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浩对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就来宾朋友的发言做出回应。李浩教授表示,专家学者对他作品的褒奖实为溢美之辞,他更愿意将其视为对他的鞭策。他感谢多年来诸多朋友对他的鼓励、与他的切磋。李浩教授自言,他的散文写作,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有生活和历史的偶然,也是一个人文学科研究者和文字工作者的宿命。在纸媒纸书日渐消逝、写作和阅读方式急剧变化的今天,他的文字如能在自娱自乐、敝帚自珍之余,为他人贡献一点不俗的趣味,为时代留下一点真实的印痕,则善莫大焉。

(本文由西北大学邱晓撰写)

●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文学院

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肇端于 1902 年陕西大学堂所设“中学门”及“西学门”辖属的“文语科”,历经百年,不断壮大。1923 年国立西北大学时期,首次设立文学院。1924 年,鲁迅先生曾应邀讲学于此。1937 年抗战爆发,西北联合大学成立,其文理学院下设国文系。1939 年,西北联合大学复名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为学校主要院系之一。1949 年后,高等教育实行院系调整,撤消院级建制,遂又改称中文系。1994 年,为适应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在原中文系基础上,成立了文学艺术传播学院。2001 年,学校恢复原文学院之旧名。

著名学者黎锦熙、罗常培、胡小石、曹靖华、杨晦、罗根泽、高亨、蒋天枢等曾在校执教;张西堂、傅庚生、刘持生、郝御风、宋汉濯、单演义、杨春霖等先生亦长期设帐讲学于此;安旗、马天祥、张华、刘建军、张学仁、雷成德、赵俊贤、薛瑞生、薛迪之、杨昌龙、周健、曹汾、赵俊玠、房日晰、费秉勋、韩理洲、阎琦、雷树田等仍笔耕不辍,新著迭出;王启兴、董乃斌、边兴昌、王富仁、同向荣、张中良、吴予敏、方兢、倪文东、牛宏宝等学者曾在本学科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知名学者何西来、王富仁、薛天纬、党圣元、罗钢、张永清,诗人牛汉、雷抒雁,作家贾平凹、迟子建、吴克敬、穆涛、白阿莹,影视编导张子良、黄建新、周友朝、张晓春,新闻工作者万武义、马利、李勇等均毕业于本学科。本学科被学界和媒体誉为“作家摇篮”“唐代文学研究重镇”“批评劲旅”。



文学院为陕西省委宣传部与西北大学共建单位,现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宗教学、美学 2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汉语国际教育、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汉语言文学(含创意写作方向)、汉语国际教育、广播电视编导和戏剧影视文学 4 个本科专业。本学科现有在岗教职工 89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24 人。在读本科生 750 人、博硕士研究生 410 人、在站博士后 16 人。

拥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人,委员 1 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长江学者 1 人,青年长江学者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博士生导师 18 人。中国语言文学为陕西省重点学科、一流学科,陕西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为陕西省特色学科,汉语言文学为教育部特色专业、陕西省一流专业,“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中心”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培育)、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工程办公室“马工程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西北大学)为首批国家级文艺研究基地,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近年来,在全院同仁的努力下,学院以打造“西部领先,国际一流”的西北大学文学院为目标,坚持“民主包容、守正创新”的办学理念,营造“团结合作、竞争开拓、繁荣发展、健康快乐”的文化氛围。全院师生团结一致、锐意进取,紧紧围绕“双一流”学科建设开展各项工作。在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1. 教育部公布 2015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名单,李浩教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张阿利教授被评为“陕西省教学名师”,并当选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3. 围绕“贾平凹研究中心”建设,聘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李敬泽为西北大学“贾平凹讲座”教授;聘请西安作家协会主席吴克敬为“西北大学驻校作家”。

4. 中青年学术梯队建设成效显著。谷鹏飞入选 2017 年度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张碧入选 2017 年度陕西省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元鹏飞入选 2016 年度陕西省“百人计划”;王鹏程获批为 2016 年度西北大学“青年学术英才”;杨遇青入选 2016 年度西北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二、科研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1. 中国语言文学进入陕西省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汉语言文学专业入选陕西省一流专业建设行列,“双一流”建设稳步推进。

2. 获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建设工程—文艺理论研究西北大学基地。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育)—“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中心(西北大学)”。



3. “汉唐文学研究院”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研究院自 2016 年揭牌以来,在李浩教授的带领下,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在研究队伍建设方面,今年九月,选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党圣元教授、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葛承雍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钟勇教授等为特聘教授。在学术活动方面,举办“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化国际高端论坛”“杜甫与长安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与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西安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在社会服务方面,牵头申报陕西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逐渐成为西北大学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力军,成效显著,影响日益深远。



4. 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与我校共同主办,我院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承办的首届、第二届“中国文艺长安论坛”顺利召开。“中国文艺长安论坛”是我校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在文艺创作与评论领域弘扬文化



自信而共同打造的中国文艺评论高端论坛。我校作为常设组织机构,拟每年举行一届论坛,开展一系列活动,为树立文化自信、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与创作的融合、创新与发展,提供精神坐标和价值参照。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新闻媒体,以及陕西省内各大媒体对会议进行了全程报道。

5. 陕西省文化厅与西北大学共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艺思想研究中心”。

6. 自2015年始,我院已连续举办第三届“作家班”,夯实我校“作家摇篮”品牌,强化我校作家培养在全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学术活动丰富多彩

1. 两年来,围绕“文化自信”“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战略,在京都与日本京都女子大学、京都大学共同举办第四届东亚汉学学术研讨会。弘扬中华文化,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文化战略,主办、承办“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为主题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柳青文学研讨会”“路遥文学研讨会”“陈忠实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杜甫与长安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柳宗元研



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化国际高端论坛”“文化写作与学人随笔专题研讨会”“第二届全国大学语文论坛”等十六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助力国家文艺发展战略。

2. 举办“长安论坛”、“名师讲坛”等系列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张江、李敬泽、陈尚君、党圣元、吴承学等 70 多人来院讲学。



3. 举办西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以校际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形式,创新我院研究生培养模式。

4. 两年来,我院教师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7 篇,核心期刊论文 89 篇。出版《镜中景观》《文史符号综通研究》《晦斋集校注》《文化自信:中华美学与当代表达》《柳青研究论集》《路遥研究论集》《陈忠实研究论集》等学术著作 14 部。

